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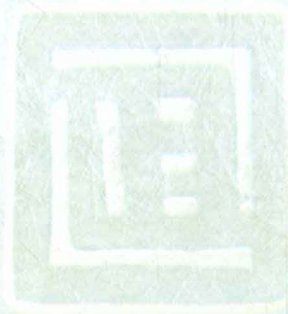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主编 ◎ 达力扎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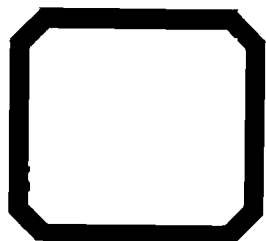
辽金科举研究

LIAOJIN KEJU YANJIU

◎ 李桂芝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LAOJIN KEJU YANJIU

辽金科举研究

◎ 李桂芝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科举研究/李桂芝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2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660 - 0008 - 8

I. 辽… II. 李…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辽金时代
IV. ①D691. 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182 号

辽金科举研究

作 者 李桂芝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3. 2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008 - 8

定 价 8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鍾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的相关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鍾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先生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该学科的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为核心，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

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收入的论著都是本中心二期建设期间的科研成果，将其奉献给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学者与我们建立学术联系，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共同为该学科的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委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所有支持和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7年10月16日

绪 言

辽金科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所谓“历久”，是因为早在清朝中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乾隆时的学者厉鹗，鉴于《辽史》不为选举立“志”，遂就其当时所涉猎的内容，在其《辽史拾遗》中为之作《补选举志》，从而开启了对辽代科举的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辽史拾遗》所补的《选举志》并不完整，所录史实也并非皆准确无误，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所谓“弥新”，则是厉鹗之后，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者，代不乏人，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20世纪30、40年代，陈东原发表《辽金元科举与教育》（《学风》第2卷第1期，1932年12月），开辽金科举与教育研究的先河。此后，方壮猷发表《辽金元科举年表》（《说文月刊》3卷12期，1944年2月）、曾资生撰写《宋辽金元的制举概略》（《东方杂志》40卷17期，1944年9月）、朱子方发表《辽朝科举制度杂考》（《中央日报》，1947年9月29日），此为厉鹗之后，对辽金科举研究的早期阶段，大体多为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抄录和初步研究。

50、60年代，有沈兼士的《辽金元的考试制度》（《考铨月刊》102、103、113期，1959年10、11月，1960年9月）、李家祺的《辽朝科举考》（《现代学苑》5卷8期，1968年8月）。

70年代，先后有陶晋生的《金代的女真进士科》（《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台北）1期，1970年9月，并收入《边疆史研究集》）、杨树藩的《辽金贡举制度》（《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5期，1973年5月）、汪其祥的《辽金元科举制度》（《编译馆馆刊》（台北），5卷1期，1976年6月）。时值中国内地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枝独秀，填补了此一时期这一课

题研究的空白，并将研究引向了深入。

80年代，大陆学者奋起猛追，论文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朱子方的《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民族丛刊》，1983年第4期）和朱子方、黄凤岐合撰的《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都兴智的《金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特点》（《吉林大学研究生论文集刊》1987年1月）、《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辽金史论集》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顾吉辰的《宋金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杨若薇的《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赵冬晖的《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和《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韩国学者金渭显的《契丹的教育与科举制度考》（《明大论考集》第17辑，1986年）等相继问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对前人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and 观点，推进了大陆和海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90年代，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先后有赵冬晖的《金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3期）、张帆的《金代国子监钩沉》（《辽金史论集》第5期，天津出版社，1991年）、单捷夫的《金朝科举其弊已甚辨》（《管理与教学》，1991年第3期）、王利静和关玉华的《金代女真策选进士考》（《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都兴智的《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丁鼎的《金人、元人所谓进士往往不是及第进士》（《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周怀宇的《金王朝科举制考论》（《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袁世贵和张文军的《浅谈辽金元三朝的科举制度》（《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1辑，地图出版社，1997年）、张敏杰的《关于徒单镒“状元”说之我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王淑玲的《略谈金代的科举取士》（《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1期）、周腊生的《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周怀宇的《辽王朝的科举制度考察述论》（《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玉年的《金代科举改革初探》（《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李文泽的《辽代的官

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韩国学者金渭显的《契丹的府州县学考》(《中国民族史研究》第4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等十余篇论文问世。从两朝开科时间、应试对象、考试科目、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在辽金两朝的地位与影响和进士对两朝政权建设、文化发展、社会风气的形成、思想品德修养和吏治的整肃等方面作了考察。广泛涉及了辽金科举与教育研究的方方面面,扩大了辽金科举研究的学术视野,并对相关文献记录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和考辨。将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进入21世纪,考古领域成果的大量出现,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资料,极大地促进了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探讨的深入,为学者们的学术探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方便,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随着辽金断代史和契丹女真史研究的日益深入,两朝科举的课题也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一些探讨辽金时期教育、思想文化和哲学的论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当时的科举制度与进士作为,于是此课题的研究进入了“弥新”阶段。10年间,涉及辽金科举、教育的相关论著有近百种之多,广泛囊括了科举、教育的制度与政策,科举考试的规模与特色,进士的仕途、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的贡献及其在思想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间断地搜集、整理辽金时期进士的个人资料,在相关论著中,开列了数份进士名录,为后来者尽其所能地搜求这一时期更多的进士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薛瑞兆出版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这是第一部专门探讨金朝科举的专著。而随着人们对科举制度研究的关注,有关科举的辞书《中国科举辞典》也在此期间问世。这一切,都为今后在辽金科举研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做了必要的准备。希望通过不断地努力,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有可能查找到的辽金时期进士,继厉鹗之后,为《补选举志》增加一份《辽登科记》,为金人李世弼的《金登科记》推出一部辑佚的成果。

辽金时期大量墓志的出土,不但使学者们掌握了大量辽金历史文献所不载的新资料,而且提供了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史实,如辽

朝进士梁颖、梁援、贾师训的墓志中不但记录了《辽史》所不载的他们的进士身份，而且有关于辽朝科场问题的珍贵记录，为今人准确掌握辽朝科举的真实情况提供了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使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以更接近实情。大量墓志的出土，既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为辨识文献记载的舛误提供了依据。这正是本课题得以完成的有利客观条件之一。经过了数百年、数代人的努力，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当今学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这是当代学者们取得新成就的有利条件，本人既得益于前人，也受到了当今学者研究的启发和帮助，这是本课题能够完成的又一重要条件。

历史赋予不同时期的学者以不同的使命，毫无疑问，本成果命中注定依然是阶段性的，由于资料缺乏和本人学术水平所限，很多问题还不可能彻底解决，对一些个人认为较有把握者，经过认真思考，得出了个人的结论，但还须要时间和更多史料的证实；有些则是推测和猜想，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以期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更有的只是提出了问题，问题的解决则有待来者。在今后的研究中随着史料来源的增多和扩大，后继者将代有其人，他们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广泛，成果将更加辉煌，业绩将更加骄人，期待着这一课题研究集大成专著的早日问世。

本课题有幸被列入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项目，得到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第二期项目的资金资助，在此谨向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学生齐伟、曹流在紧张的学习期间多次帮助查找、核对资料；友人周锋先生也为我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和相关书目；学校图书馆相关书库和阅览室工作人员亦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使书稿得以顺利完成，于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再一次向为书稿撰写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单位与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受本人学术水平和用功程度的限制，本书定有一些谬误和缺漏，还望学界同仁予以订正和补充。

Contents

辽朝篇	(1)
一、辽朝科举制度	(1)
(一) 科次	(1)
(二) 取士科目	(8)
(三) 程式与条例	(24)
(四) 人才培养与学校	(33)
二、进士仕履	(38)
(一) 进士仕宦经历总汇	(38)
(二) 对辽朝进士仕宦经历的几点认识	(61)
(三) “楚才晋用”者	(82)
三、辽朝进士杂考	(90)
(一) 登第时间考	(90)
(二) 进士名字考	(95)
(三) 疑似进士	(97)
(四) 似是而非者	(105)
(五) 进士韩昉家世考	(106)
附：辽朝进士名录	(108)
金朝篇	(133)
一、金朝科举制度的确立	(133)
(一) 金初的形势与科举的滥觞	(135)
(二) 金初的五次考试	(138)
(三) 金朝科举制度的确立	(142)

二、金朝的科举制度	(144)
(一) 取士科目	(144)
(二) 科次	(162)
(三) 取士数目	(189)
(四) 程式与条例	(191)
(五) 禁令与科场搜检	(206)
(六) 取士等第	(206)
(七) 进士授官	(209)
三、人才培养与学校	(232)
(一) 国子学、太学	(234)
(二) 女真学	(235)
(三) 府州县学	(236)
(四) 学官	(246)
(五) 赡学养士之法	(246)
(六) 教育之制	(247)
(七) 私学	(247)
四、进士在金朝政治与社会中的影响	(251)
(一) 进士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	(252)
(二) 进士与文化发展	(264)
(三) 策论进士的表现与贡献	(266)
五、金朝进士杂考	(271)
(一) 进士姓名考	(271)
(二) 登第时间考	(279)
(三) 非登第进士	(283)
六、辽金进士世家	(285)
(一) 浑源刘氏	(286)
(二) 弘州魏氏	(290)
(三) 云中孟氏	(293)
(四) 宛平刘氏	(293)
(五) 易州魏氏	(295)
(六) 玉田卢氏	(295)

（七）三世状元大兴吕氏	（296）
（八）大兴“六桂堂”吕氏	（299）
（九）真定杨氏	（301）
（十）兴中马氏	（302）
（十一）东胜一析津“程一举”	（303）
（十二）河中李氏四桂	（304）
（十三）太原三桂王家	（305）
（十四）兴州刘氏	（305）
（十五）广宁梁氏	（306）
（十六）莒州张氏	（306）
附：金朝进士名录	（309）
参考书目	（513）

辽 朝 篇

一、辽朝科举制度

（一）科次

《辽史》不立《选举志》，以往涉及辽朝科举制度时，人们往往引用《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试士科制》的相关记载。然而，《试士科制》的记载是不同时期史料的拼凑，并不能准确反映辽朝科举的实际情况。首先，关于开科时间，《试士科制》载：“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①文中虽未明言究竟几世后“始有开辟”，但数世，显然非指一世、二世。但辽朝的进士，最早见于记载者，恰恰出于二世辽太宗时。

辽圣宗时任南院枢密使、参知政事的燕人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②。

辽太宗灭晋后随河中节度使赵赞入汉、事周又归宋的幽州人宋琪，“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时天福六年也”^③。

涿州人刘晞，“陷于契丹，契丹以汉职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④。

上述三人，登第、知贡举时间都在辽太宗时，室昉登第的会同初，按一般的理解，当系会同元年（938）。宋琪的登第时间明确记载为天福六年，即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刘晞是否进士，并不明

① 《契丹国志》卷 23《试士科制》，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26 页。下同。

② 《辽史》卷 79《室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版，第 1271 页。

③ 《宋史》卷 264《宋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年版，第 9121 页。

④ 《旧五代史》卷 98《刘晞》，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年版，第 1317 页。

确，但他三知贡举的时间皆在天福（936—943）中，即辽太宗天显十一年至会同六年。可知太宗时辽朝已经开科取士，这与金得燕地后急于得汉人治理汉地的情况极为相似。假定室昉、宋琪登第之科皆由刘晔知贡举，那么，太宗时也至少有过3次科举。故辽朝的开科取士当在燕云十六州入辽后，只是此时尚无定制，一切沿袭当时、当地情况从权而已。

此后，世宗朝尚未发现有关科举取士的记载。穆宗应历十年（960）前，有进士常遵化，^①十五年（965）有“前乡贡进士郑熙”。^②常遵化在应历十年除霸州文学参军，其登第时间当在应历前期。郑熙既为乡贡进士，当然也说明穆宗时也有礼部试，所以穆宗朝虽然没有关于开贡举的相应记录，但可推断当时确曾开科取士。到辽景宗以后，《辽史》就有了较为系统的记录了。保宁八年（976）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③贡院作为科举的重要机构得以恢复，是开科取士的必要筹备工作，可视为科举由权宜向制度化转变的开始。《辽史拾遗》记载易州人魏璟为保宁九年进士，不可信（详见《金朝卷》之《进士杂考》）。但景宗时一定曾经开科，是不容置疑的。甚至保宁九年确曾开科，也是极有可能的。统和九年（991），为韩瑜撰写墓志的郝云，署衔“前进士”，^④他或许就是景宗朝进士。《辽史·景宗纪》没有像《圣宗纪》那样开科取士年份、状元姓名和取士人数的记录，应系记录不全所致，有理由推测，辽朝的科举自贡院恢复后，开始向正规化前进了。

圣宗时，统和二年、五年分别有进士登第的记录，但可信度依然值得怀疑，故不计入。至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⑤，并录取高举一人及第。此后，除个别年份外，几乎每年都有开科取士的

① 《常遵化墓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公幼而聪敏，长以刚直，辩理从童，登场得第（第）。”

②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③ 《辽史》卷8《景宗上》，第96页。

④ 《韩瑜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93页。

⑤ 《辽史》卷12《圣宗三》，第133页。

记录。可以判定，此时科举已经制度化。统和五年后圣宗在位的44年间，有记录的科举考试共进行了30次。其中统和六年“诏开贡举”后至统和二十九年（1012），24年间共开科18次，^①无科年份只有6年，仅占1/4。开泰年间开科6次，^②但从开泰五年（1016）后，两年开科一次，无科年份也不足全部年份的1/3。太平年间开科6次，^③无科年份将近一半，可推断开泰五年后，两年一科。

没有开科记录的年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确实没有开科；二是原始记录不全，文献失载。圣宗时开科次数已经占到他在位年数的70%，考虑到《辽史》相关内容缺失的因素，我们推断圣宗时科举考试原则上为每年进行一次，可能去史实不致太远。这一点，也可从宋人的记载中得到证实。除《宋史·宋琪传》称“契丹岁开贡部”外，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使辽的路振，在《乘轺录》中 also 说辽朝“岁开贡举，以登汉民之俊秀者”。^④

但是，从统和、开泰后期和太平前期多次隔年开科的情况看，圣宗时也已有了改变每年开科的意图和实践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仁宗天圣九年（辽兴宗景福元年，1031）六月辽圣宗病逝后记载，契丹“三岁一试进士”，^⑤在《辽史》的记载中得不到印证。这一说法，在《辽史》圣宗朝得到记录支持的只有太平五年至八年一次，显然不能作为兴宗以前辽朝开科年限的正确记录。它可能是李焘在辑录《长编》时将圣宗以后的相关记录提前的结果，但考察兴宗和道宗时，3年一试的情况也并不多见，只是到辽末天祚帝时，才3年一开贡举。所以，断定太宗至圣宗时每年开科取士可能是比较接近

① 此18次分别为统和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年。无科年份为统和元、二、三、四、五、十、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

② 此6次分别为开泰元、二、三、五、七、九年。无科年份为开泰四、六、八年。

③ 此6次分别为太平二、四、五、八、九、十一年。

④ [宋]路振：《乘轺录疏证稿》，见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74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62页。

实情的。辽朝科举之初，当是沿袭五代之制。五代各朝，都是每年开科。《五代登科记总目》载：“五代五十二年，其间唯梁与晋各停贡举二年，则降敕以举子学业未精之故。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固未尝废也。然每岁取士，其多者仅及盛唐时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离，固无怪其然。”^① 辽朝的情况与五代类似，战乱之时，士子的学业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士子由晋入辽，还需要有一段情感、志向的转变过程，故统和前期，为争取士子效力，遂每年开科，而取士人数却一直很少。经过一段时间的涵养，人心渐被征服，取士人数相应增加后，科次相应减少，应在情理之中。

兴宗时，《辽史》有明确记载的科次有重熙五年（1036）、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6次，除重熙五年、七年两次间隔1年，十九年、二十四年间隔4年外，其余几次皆间隔3年。

需要说明的是，《辽史·兴宗一》在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改元景福前，记有“是年，御宣政殿放进士刘贞等五十七人”，^② 又在重熙元年（1032）年末，重复记录了“是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③。历时一年余，两次取士，人数皆为五十七，状元一为刘贞，一为刘师贞；一不载放榜地点，另一则记“御宣政殿”。罗继祖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两者为同一事件的重复记录。他以重熙元年为正，而以太平十一年所记为重出。^④ 但按李三畋撰写于清宁九年（1063）的《张绩墓志》推断，应以太平十一年下所记为正，重熙元年所载为重出。《墓志》称：张绩“于太平末岁，属而立，进士乙科登第。景福初，解褐，授将士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重熙初，覃加文林郎、武骑尉”^⑤。张绩卒于清宁四年（1058），享年57岁，

①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2—283页。

② 《辽史》卷18《兴宗一》，第211页。

③ 《辽史》卷18《兴宗一》，第214页。

④ 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卷18《兴宗纪一》，录自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台湾鼎文书局本，第18册第17页。

⑤ 《张绩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13页。

当生于1002年（统和二十年），至太平十一年（1031）正好30岁，“属而立”。故张绩参加礼部试当在太平十一年六月前。辽圣宗六月己卯（初三）驾崩，故未及放榜。兴宗即位后，辛卯（十五日）改元景福，并亲御宣政殿放榜。是科举考试在六月初三前举行，六月十五后放榜。因而，《张绩墓志》才会有“景福初，解褐，授将士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的记录。所以，此科从考试到放榜，经历了圣宗、兴宗两朝。张绩从考试、放榜、解褐、加官，虽只两年，却有3个年号，太平末和景福初实际皆在1031年。第二年，兴宗改元重熙，张绩则由将士郎覃加文林郎。按唐制，将士郎属文散官从九品下阶，文林郎属从九品上阶，张绩解褐次年，官晋一阶。张绩家人或《墓志》作者可能考虑两年中改元频繁，易致混乱，故对时间前后记载颇详。所以，兴宗时刘贞（师贞）一榜，应计入太平十一年而不是按《辽史·兴宗纪》计入重熙元年。无论如何，兴宗时大体上仍是四年一科。

道宗朝（1055—1101），有记载的科举考试时间为清宁五年（1059）、八年，咸雍二年（1066）、六年、十年，大（太）康五年（1079）、九年，大安二年（1086）、六年、八年和寿昌元年（1095）、六年12次。^①其中间隔一年者1次，二年者3次，三年者5次，四年者2次。大体上也还是四年一科。需要说明的是《辽史·道宗一》清宁元年岁末有“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②的记录。按四年一科计，兴宗重熙二十三年正当科举之年，但当年没有科举放进士的记录，该科推迟至第二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重熙二十四年夏，辽兴宗在南崖行在已经病重，八月病逝，道宗即位当月即改元清宁。因此，当年载于岁末所放的进士，其礼部试是道宗即位后举行的，还是兴宗在世时进行的，就是本科该计入兴宗朝还是道宗朝的关键。撰写于乾统三年（1103）

① 耶律俨撰：《道宗皇帝册》：“一十三次，选士悬科。”可知道宗朝13次科举均已记录于史籍。《辽代石刻文编》，第514页。需要指出的是，此13次，是包括了清宁元年一科的，而我们的统计是将该科纳入重熙二十四年的。所以，实际上道宗朝开科12次。

② 《辽史》卷21《道宗一》，第253页。